

在德国小城扎堆看球

余斌

动”，不想“群众”还可归类。“牧鹅少女”一角那处酒吧，大体上属体面人斯文看球，一张张小桌，坐得宽松。转到不远处一条步行街上，却是另一景象，我是被鼎沸的人声吸引过去的，那家酒吧肯定是球迷看球的一个据点，长条桌，一排排人挤在一处，大体是年轻人的天下，且从衣着长相看，颇多“第三世界”的意思。德国真是个守规矩的国度，街道的另一边也设了桌凳，中间隔了一条两三尺宽的道，依然通行，那边都老老实实隔街遥看，并不挪将过来，倒是前面又席地坐下一排学生模样的，不消说，前面一溜酒杯或酒瓶。

既然是来体验扎堆的热闹，当然该留在“第三世界”，何况比赛已经开始，回到住处或是再去觅座，已然时不我待。于是平生头一回，站着看了整场球。大白天，电视泛白，当外围观众，位置远而偏，画面几乎看不清，不由暗生悔意，也捉摸周围的看着；不舒舒服服在家看电视，大老远跑来受这罪，真是何苦来哉！就算是有座的人，哪里有近距离躺在沙发上惬意，看得分明？当然，图的是虚拟的在场感——现场看球，几万人偌大球场，不也是要看清球员身上的号码吗费眼神，哪有电视转播近景、特写那样清晰？

如此这般，心神不属，直到墨西哥进球，我才算进入“规定情境”。与德国队的梁子，是好多年前结下的——那一年德国战车半决赛打加时胜了普拉蒂尼率领的法国队，从此便不由分说地“仇德”。墨西哥进球那一刹那，忘情大嚷了声“好球”，引来周围的讶异，才意识到身在德国球迷堆里，谁都不懂的中国话也不能让我的立场隐身。喊不得，手舞足蹈不得，接下来的时间就变得很难受，仿佛自己成了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党，在演一出潜伏。

——这当然是自我戏剧化了，其实人家也就是看一眼，忙着为自家的队焦虑，对对方的支持者倒挺心平气和。有个球迷显然比我“过分”得多，穿着墨西哥队服，南美人的长相，原是有位子的，那一刻“噌”地站起，高举双臂大声嚷嚷，比赛结束后又是大唱墨西哥歌曲，又是和一女子相拥起舞，也犯错了众怒，周围的人对他的忘情反倒多是报以会心一笑。我想只因我一副亚洲人的面孔才让他们觉得奇怪吧？

但扎堆看球的滋味再不想咽了：一之为甚，岂可再乎？倒霉的是，憋屈站着看了半天，热闹还没看到，因为德国队输球，球迷看球时着急上火地喊，比赛结束也就无声无息做鸟兽散了。说好的国足在德国是个神话，德国人狂热无比的呢？……

没想到我扎堆看球还有第二次，而且又是德国队的比赛。是出游一趟回到哥廷根。那天七点五十下的车，十分钟后就是德国对瑞典的关键一战，人在德国，似乎此战就得看得格外刺激。赶回住处是来不及了，准备自食其言，再站着看一场球，没想到路经一酒吧，看球的人居然坐得稀稀拉拉，买杯啤酒坐下来，有望外之喜。

可扎堆看球的氛围大减。球迷有不祥预感，猫家里不出动了？上半场打成一比一，周围的人照样上演激动与沮丧的轮替，兴奋度却反不及上一场，弄得我也没了情绪，暗想如此这般，不如乘中场休息赶回去独自看。瑞典队阵形不乱铁桶阵，德国无计可施，想来多看几分钟也未见得落下多少精彩。却是心有不甘，又从上次看球处绕了一下，还是人多，球迷却有几分蔫头搭脑的。一路回去，两边的人家鸦雀无声，一如平日的宁静。回住处打开电视，德国队仍在围攻，却是一次次无功而返，谁都以以为要以平局收场了，而后毫无预兆的，德国队仿佛补时进球了。

回来看报道，德国队“钢铁般的意志”云云，又拿来说事儿了。可下半场，特别是快结束时，德国队员分明没脾气了，就像我见到的球迷没了脾气一样。最后的那粒进球，与其说是意志的胜利，不如说是证明了足球的戏剧性吧？

比赛结束的那一刻，汽车的喇叭声响成一片，还有巨大的人声，隔着好几里地从市中心那边传过来，此前几声称得上寂静的小城仿佛忽然之间活过来了。小城如此，可以推想，整个德国都在陷入狂欢。死去活来，就在一线之间，足球真是能颠倒众生啊。

第二天起来，听见教堂的钟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不由又往足球狂欢上联想，问了人才知道不是——礼拜日而已。

附记：

德国对韩国的这场比赛，我是和一个访问学者和一伙中国留学生在一家酒吧看的。有上一场的绝处逢生垫底，德国球迷这次大概是准备轻松看场球，欢庆小组出线的。小城里一下新增了许多看球的地方，别看酒吧里到比赛开始时还稀稀拉拉，座位都已订出去了，不少人并不期待赛场上的戏剧性，等着的是可以预料的结局，看上几眼，而后就是走上街头狂欢。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这场比赛结束，德国队居然要卷着铺盖回家了。街头的嘉年华当然是免了。若是与上一次的狂欢有个照应，似乎应该有一个愤慨了，其实没有。我只看到一个头戴国旗假发的球迷当街咆哮了两声，路上行人各走各的路，仿佛没听见。甚至地下也没见一个碎玻璃瓶。电视上看，柏林的球迷也还平静，倘“心碎了一地”也没发泄于外。我倒是很有些惻隐之心地想：习惯了世界杯主人翁精神的德国球迷，往下的球怎么看呢？

卡夫卡究竟是怎样的人

黄雪媛

今年7月3日是卡夫卡诞辰135周年，围绕这张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文学标签”的纪念文字估计会重新热闹一番。而我们纪念一个作家的目的，是为了能最终回归他的作品中去。

中题材的丰富和细节的精确定究竟从何而来，而不仅仅简单地把这种写作才能归功于一种幻想天赋。卡夫卡本人所说的“我头脑中的广阔无垠的天地”有相当一部分构建于他的旅行经验。

卡夫卡还是一个体育运动爱好者，这无疑与大众对他的固定印象——弱不禁风，患有肺病——大相径庭。卡夫卡34岁时查出肺结核，此后休养和治疗断断续续，39岁时健康状况恶化，迫使他不得不结束保险公司的的工作。卡夫卡生命的最后岁月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几家医院和疗养院辗转，41岁时在夏天去世。疾病缠绵并不说明卡夫卡的短暂生涯中与运动和探险猎奇无缘。他在大学时代就参加当时流行的骑马和网球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在超过十年的时间里，卡夫卡每天坚持健身训练，并引以为傲。他还喜欢在布拉格周边地区进行连续几小时的徒步运动。好友布罗德记录了卡夫卡的这一爱好：

“卡夫卡和我都热爱徒步旅行。每个星期天，往往还有星期六，我们都在布拉格周边的森林里。森林之美激起我们对纯真和热情的崇拜……我们在森林的溪涧里游泳，因为当时卡夫卡和我都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我们只有在鲜活的，流淌的溪水中游泳，以这样的方式与乡村建立一种近乎肉体的联系的时候，才觉得我们拥有了‘乡村’。”（马克斯·布罗德《争吵不休的生活》）

卡夫卡不仅是一个灵活而富有耐力的业余游泳运动员，他还热衷于皮划艇运动，很长一段时间内，卡夫卡甚至拥有一艘皮划艇。患上肺病后，卡夫卡仍然乐于向他人展示自己划艇的技巧和速度。1922年是卡夫卡健康状况恶化的一年，他从疗养地写信给布罗德：

“最亲爱的马克斯，可惜你不能来小住几天，如果天遂人愿，我们就可以整天爬山，滑雪橇和写东西……”

卡夫卡和好友们在一起时，常常表现出他热情洋溢、风趣幽默的时刻。布罗德回忆，卡夫卡在朋友小聚的场合经常朗读自己的作品，每当读到一个好笑的段落，他就会大笑起来，大家一起笑得前俯后仰。

这和卡夫卡在家庭生活中的表现形成巨大的反差。卡夫卡一生都执着于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从小饱受父亲压制、成年后也无法摆脱畏父情绪的疯子。在卡夫卡的书信和日记中，尤其是他写给父亲（却从未寄出）的一封长信中，我们确实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印象：父亲赫利曼是家庭生活中的暴君，我们从而推断出卡夫卡个性中的懦弱、自卑、缺乏安全感，优柔寡断等，相当程度是父亲的专制和威力在他身上作用的结果。

“我所有的思考都在你的重压之下，我的想法与你的不一致时也是如此，而且尤其如此。所有看上去不依赖于你的想法从一开始就被你的贬斥压得很沉重；承受这样的评判，以致完整而连贯地阐明我的想法，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此，我们就能解释卡夫卡小说

要你反对或仅仅料想你会反对；而差不多我所做的任何事，料想到你都会反对的。”（卡夫卡《致父亲的信》）

没完没了的怨气情绪促成了两个著名短篇《变形记》和《判决》的诞生。我们目睹《变形记》里的主人公格里戈尔·萨姆沙在家庭和职业关系里的自我疏离和异化。卡夫卡让萨姆沙代替了自己，幽幽地控诉着自己受到家庭方面，尤其是来自父亲的严重伤害。我们也通过《判决》，看到卡夫卡作为“永远的儿子”的自我投影：儿子企图反抗和惩罚衰老病朽的父亲，却被洞察一切的父亲击败，于是儿子对自己执行了判决：飞奔出门，投水自尽。

于是，熟悉卡夫卡审父情结的读者，在翻看卡夫卡的照片时难免就会生出惻隐之心。其中有一张是卡夫卡四岁时拍摄的。照片中的男孩穿着款式复杂的紧身小礼服，手拿宽檐帽和儿童手杖，一丝不苟的打扮衬托着一张严肃拘谨、不知所措的小脸。青年时期的卡夫卡有一张身着西装的照片，脸庞端正清秀，眼神里有一种望不到尽头的忧郁。

卡夫卡沉浸于和自我的交往，像一个严格的实验室工作人员，观察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对心灵的任何活动都具有无比精细的感受力，把它们一一记录。用日记进行经年累月的自我观察和自我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读者对作家个性的判断。

近年来陆续出版了三本卡夫卡不同时期传记的德国作家雷纳·斯塔赫这样分析卡夫卡的自我观察癖：“在卡夫卡那里，自我本身是一个远处的有生命之物，它似乎像哈雷彗星那样正在远远离去。只有通过写作，作家才能将自我置于更易于看到的视野之内，让自我受到观察和审查。”日记和书信像一个望远镜，它逐渐移近自我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构自我的过程。卡夫卡有意识地在这类写作中创造出一个个自我。

通信也构成了卡夫卡日常生活的一个重心，他留下了1500封信和12本抄录了自己信件的手笔记本。有相当一部分信件是他有意用文学的笔调“加工”过的，卡夫卡的信件比他同时代所有作家的信件都更具文学性。它们非常绵长，即便没有通信对象，也自成一体。在1912年的三个月内，卡夫卡就给当时的女友菲丽丝·鲍尔写了近九十封信。若信件未及时寄到，卡夫卡就会魂不守舍，而信件的丢失简直就是“灾难的顶峰”了，他因此茶饭不思，喋喋抱怨。“最亲爱的，信丢失了，丢失了，或许我患上被迫跟踪妄想症了。”通信构成了一种卡夫卡生活中特有的现实，那就是生活仿佛是为了这些信件而运转，它们引导了生活的方向，而不是反过来。频繁的文字往来代替了现实生活中的交流，卡夫卡和菲丽丝·鲍尔几次订婚都以失败告终。卡夫卡自己对此有过评论：

“我们用这些频繁的信件相互殴打。因此而产生的不是接近，而是接近和距离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这种中间形式是不堪忍受的。”

在卡夫卡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遇

到了捷克女子密莱娜，这是他一生中富有激情的一段关系。但两人的交往，依然延续“书信爱情”的模式。卡夫卡在信件中向密莱娜倾诉着巨大的幸福，同时自我贬低和自我怀疑如影随形，他甚至把自己比喻为密莱娜“大家庭里那只老鼠，一年之中人们顶多能允许它公开横穿地毯一次”。

在日常生活中，卡夫卡是一个充满矛盾，喜欢推翻自己先前论断的人。比如他一方面是个书信交往的狂热爱好者，这种狂热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方面又会宣称：

“我觉得一切书信都毫无价值，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写信意味着在幽灵们面前裸露自己的宣体，这正是幽灵们企盼着的。写在信里的吻到达不了它们的目的地，它们在中途就会被幽灵们吮吸干净。”（卡夫卡致密莱娜）

对于卡夫卡还存在一种观点，卡夫卡是一个没有历史感的，对自己所处时代漠不关心的，不务实际的空想家。确实，卡夫卡的作品里几乎没有他所经历的时代大事件的痕迹。

“德国已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学校。”

这是卡夫卡1914年8月2日的一则日记。对于整个欧洲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战，卡夫卡竟然只是一笔带过，游泳所代表的私人生活仍然正常延续。卡夫卡在大街上围观奥匈帝国的炮兵开拔仪式，但他承认，自己“热切”祝愿这些军队“万事不如意”；群众对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爆发欢呼，卡夫卡对此写道：“我流露出邪恶的目光站在一旁。”传记作家阿尔特认为卡夫卡对于战争爆发的漠视态度“并非源自激进的和平主义，而是来源于集体热情激烈迸发而产生的陌生感……”

8月6日，欧洲已经陷入严重危机。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描绘我的梦幻般的内心活动的意识已经使别的一切东西变得无关紧要，它们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失去了活力并正在不住地失去活力。”也许，正是外部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这个敏感的犹太人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局外人身份，他决意要把未来的生活全部献给文学创作。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卡夫卡的写作进入一个井喷期，他感觉“自己又沉浸在写作中了”。长篇小说《诉讼地》和《失踪者》就是这段时期的产物。

至于说到卡夫卡对待职业的态度，如果不是因健康受损而不得不提前退休，卡夫卡完全称得上一个称职的并“富有才干”（英国学者里奇·罗伯森评价）的保险公司职员。由于专门负责工伤事故防护鉴定，卡夫卡对奥匈帝国波希米亚地区的官僚体系了如指掌，他熟悉办公室文案工作的所有细节，还经常去各个工厂实地视察。正是这份必须务实严谨的工作给卡夫卡提供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使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在职业关系中耗竭生命的小职员形象。

最终，我们讨论一个作家的真实面目，是要回到一个本质的问题上来，即何谓“真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借用卡夫卡的一则寓言式的散文：

“因为我们就像雪中的树干。表面上看起来，它们乎乎地立在雪面上，仿佛轻轻一推就能移动它们。不，我们移动不了，因为它们与大地牢牢相连。但是你瞧，就连这个也只是看上去如此而已。”

短短几行字就能体现出卡夫卡叙事艺术里的一个重要特征：表象和事实始终在变化，在滑动，在转换和颠覆。卡夫卡试图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看到什么，而是怎么看。正如现实具有不同版本，人性也有许多个侧面，构成一个复杂幽微的整体。而一个作家的“真实”，既源自于他书写中的真实，也离不开他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事实”，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让我们看到一个更为丰富而立体的卡夫卡形象。

今年7月3日是卡夫卡诞辰135周年，围绕这张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文学标签”的纪念文字估计会重新热闹一番。而我们纪念一个作家的目的，是为了能最终回归他的作品中去。卡夫卡的全部创作不仅映照出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秘密关系，在本质上而言，更是人与自我本性之间的博弈关系。只有当我们真正进入卡夫卡的字句里，进到他的叙述的中心里，才能领略到他那面深潭般神秘而富于变化的文学之镜。



瞬间·永恒（油画）刘颖悟